

为了指导全国群众工作深入开展，根据毛泽东“找人来”的指示精神和“解剖麻雀”的工作方法，1939年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与华北六个不同地区的有关同志谈话后，针对群众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撰写了《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一文。他在文中阐述了加强群众工作的方式和方法，这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群众工作的重要历史文献。时至今日，它仍散发着理论的光辉。

充分发动群众是开展一切工作的关键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拉开了全国性抗战的序幕。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在华北，以国民党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已经结束，以共产党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1937年11月15日，北方局在《关于目前形势与华北党的任务的决定》中指出，“要进一步独立自主地领导游击战争，争取广大的乡村成为游击战争的根据地”。在中共中央和北方局领导下，华北各地党组织充分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广泛发动群众，与八路军协同工作，相继创建了晋察冀、晋冀豫、晋绥、冀南、冀鲁豫、山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形成了敌我双方“犬牙交错”的战争格局，有力推进了中华民族抗日战争事业的展开。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华北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学工作都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考虑到战略相持的阶段特征，要巩固和发展华北抗日根据地，群众工作还是有不少弱点。从党的方

做好群众工作应成为共产党人的看家本领——重温陈云《开展群众工作是目前地方工作的中心》

□石立国

发动群众必须改善群众生活

抗战时期，华北根据地处于对日斗争的最前沿，需要大量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的补充，这些补充只能依靠民众，随着战事的不断发生，民众的负担呈加重趋势。休养才能生息，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学等机构不能仅向群众索要东西，不考虑群众的实际情况，“置群众的痛痒于不顾，而要开展群众运动，要群众热烈起来与党与政府与军队一道艰苦奋斗，这是不可能的事”。

中国共产党人是主张改善群众生活的，同时抗战时期群众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加强抗战力量。注意群众的切身问题，帮助他们解决困难，这是发动群众的关键。为了发动群众，必须要把解决群众的切身利益列入地方党部的经常议事日程，经常了解群

众的情绪、诉求和现实困难，研究解决路径；群众生活改善得愈多，他们参加抗日的积极性就愈高，群众切身问题解决好了，他们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相应提高了，群众才会更加拥护党和信仰党，党的威信才会水涨船高。与此同时，党的有关政策制定了，党的区委、支部和小组仍需要紧紧依靠工农，深入到各个阶层的群众中去，把群众发动起来，让他们自己认真讨论，进行深化细化具体化工作，以便更好地实现广大群众的迫切要求。

发动起来的群众，力量是巨大的。1941—1943年是华北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日本侵略军的野蛮进攻和国民党的包围封锁，加上自然灾害频发，华北各根据地财政发生极大困难，面积大幅缩水，党员人数和正规部队的力量都削弱了1/3到1/2，要维持农民在粮食和人力补充方面的支持，变得极端困难。为此，华北各地继承和发扬群众工作的优良传统，依靠人民群众，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开展“拥政爱民、拥军优抗”运动，把武装斗争和群众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党政军民学同甘共苦，成功粉碎了日军多

次“扫荡”“蚕食”活动，根据地迎来了恢复和再发展，为战略反攻和抗战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开展群众工作离不开好的工作方法

在群众工作中，要坚决依靠群众，坚决摒弃“命令主义”和“尾巴主义”，用良好的工作方法来发动群众、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否则会缘木求鱼、劳而无功。针对华北地区群众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陈云提出了三条工作方法。

一是学会开会。开会的目的在于沟通上下、协调左右、解决问题，不是“清谈馆”“月旦评”。处于抗日战争这种战时环境，开会不是一件小事，需要考虑方方面面，陈云指出：“开什么会，怎么开法，讨论什么问题群众愿意来，群众来开会走路方便不方便，都要认真考虑，做好准备。”我们不需要中组部巡视团曾经参加过的华北某支部那样的小组会，它不提出任何拟讨论的问题，相互推诿、说车轱辘话；我们需要着力讨论与群众切身利益相关问题的会议，形式要生动

活泼，不能耽误群众很多时间，要能解决群众的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需要。二是重视典型的力量。抗战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把党的工作主要方面放到战区和敌后”，中组部的工作重点也随之转移，因为华北是全国抗日的前哨，既是日军进行封锁和“扫荡”的主要目标，又是国民党顽固派制造反共摩擦的主要地方，所以陈云尤为关注华北工作，以晋察冀边区一个好支部为例，说明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解决群众切身利益才是做好群众工作的中心环节，通过树立典型，介绍经验，进而推动工作进展。

三是向群众学习。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毛泽东常讲共产党员“每天都是民众的教师，但又每天都是民众的学生”，要解决群众的切身问题，共产党人不能墨守成规。陈云指出：“必须在群众中去讨论，到群众中去找寻。因为只有群众才真正了解他们自己的问题，只有在群众中才能讨论出在当时当地解决问题最适当的办法。”

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重温陈云这篇开展群众工作的重要文章，对于我们站稳人民立场，践行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做好新时代的群众工作，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重读經典

以『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为目标

——梁漱溟的治学之道

□王晓兵



梁漱溟（1893—1988年），是我国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当代文化名人，在国内外享有盛誉，与熊十力、马一浮合称为“现代三圣”。梁漱溟毕生治学，博通古今，学贯中西，著述甚多，成就卓著。他的治学以“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为目标，不单是求知识，“求知识盖所以浚发我们的智慧识见”，“有智慧识见发出来，就是生命向上自强之效验，就是善学”。梁漱溟所谓的“学”，是人生实践之学，指一切做人做事，而不止于学知识。通过研读《梁漱溟全集》，可以真切体会

到，梁漱溟的治学与其生命、生活是一个有机整体。梁漱溟为实现“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形成了一系列的治学之道。梳理其独特的治学之道，对我们今天的读书治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学问必经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有受用”

梁漱溟认为治学必须用心自学，通过切身自学求得来的学问，才能被消化吸收，融会内化为自家心得，才是真学问。

他在《我的自学小史》的序言中说：“学问必经自己求得来者，方才切实有受用。反之，未曾自求者就不切实，就不会受用。”俗话说“学来的曲儿唱不得”，便是此道理，模仿着唱，不好听，“必须将所唱曲调吸收融会在自家生命中，而后自由自在地唱出来，才中听”。“学问和艺术是一理，知识技能未到融于自家生命而打成一片地步，知非真知，能非真能”。自学对每个人来说，都至关重要，“学校教育不过给学生开一个端，使他更容易自学而已”。任何一个人的学问成就，最终都是出于用心自学得来的。因此说，“一分自求，一分真得；十分自求，十分真得。”

他在《朝话》中指出：“学问就是能将眼前的道理、材料，系统化、深刻化。更扼要地说，就是‘学问贵能得要’，能‘得要’才算学问。”其中得要，就是心得、自得。并进一步说：“学问也是我们脑筋对宇宙形形色色许多材料的吸收，消化。吸收不多是不行，消化不了更不行。”“在学问里面你要自己进得去而又出得来，这就是有活的生命，而不被书本知识所压倒。”读书治学要注重消化吸收，融会贯通，才能成为自家心得。如果只是读死书，或者死读书，即使把很多东西都记下来，只会觉得负担很重，没有内化为自己的东西，无法运用自如。

“活到老，学到老”，更要“思考到老”

梁漱溟毕生坚持独立思考，他曾说自己是“问题中人”，一直致力思考和研究人生问题和社会问题。

梁漱溟曾在1987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于我这样的九五老人，所剩的日子屈指可数了。但我丝毫没有颓唐、悲凉的黄昏之感。语云：‘活到

老，学到老’，我加一个‘思考到老’。只要我的脑子还能用，我将在自己的人生旅途上继续走下去。愉快而充实地送走这最后一段岁月。”梁漱溟的一生确实是这样做的，年过九旬，还撰写出版了《人心与人生》等著作。张岱年曾评价说：“梁漱溟更是一个特立独行，坚持独立思考的严肃思想家。梁漱溟考虑问题非常认真。”费孝通亦对梁漱溟的独立思考，对他的治学、为人，“一直抱着爱慕心情的”。

梁漱溟在《1928年在广州中山大学的讲演》中说：“我不知为何特别好用心思，我不知为什么便爱留心问题，——问题不知如何走上我心头，请它出去，它亦不出去。”他在为纪念北京大学90周年而写的《值得感念的岁月》中说：“从我十几岁会用思想之日起，就爱寻个准道理，最怕听无可无不可的话。凡是我心中成为问题的，便不肯忽略过去。”梁漱溟喜欢用深思，乐于追究问题，经常沉溺在思想中，亦时时记录其思想所得。他曾将对人生苦乐等问题的思索写成长文《究元决疑论》，刊发在1916年的《东方杂志》，获蔡元培赏识，被特邀到北京大学讲授印度哲学。梁漱溟的一生都在思考，敢于寻根问底，敞开思想，并且他的生活与思想见解是成一整个的，思想见解到哪里就做到哪里。

学会自觉自省，“一个人最怕无自知之明”

梁漱溟主张无论治学还是做人都要自觉、自知、自省，都应坚持时刻反思自省，常思已过，方能不断向上自强。

梁漱溟自认为是个很笨很呆的人，资质平常，没有过人之才，但他有一片向上心，自知好学，从不偷懒，平素总对自己有一种要求，不肯让一天光阴随便马虎过去。特别是从十三四岁开始，“常有自课于自己的责任，不论何事，很少需要人督促”。他认为，“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要紧在生活中有自觉”。梁漱溟还说：“一个人缺乏了‘自觉’的时候，便只像一件东西而不像人，或说只像一个动物而不像人。‘自觉’真真是人类最可宝贵的东西！”

梁漱溟在写的《寄宽恕两儿》信中告诫说：“一个人最怕无自知之明，既能自知所短，则其短处之遗害已去一半矣。因随时自觉，此自觉心即此短处之反面也，虽不能就反过来，亦不致顺着短处下去了。”他在《我的努力与反省》中指出，“许多青年最大短处便是心思不向内转，纵有才干，甚至才气纵横，亦白费，有什么毛病无法救，其前途亦难有

成就。反之，若能向自家身心上理会，时时回头照顾，即有毛病，易得纠正，最能自己寻路走，不必替他担忧了，而由其脚步稳妥，大小必有成就，可断言也”。人贵有自知之明，认清自己的不足，才能不断完善自己，有所成就。

亲师取友，“以融化感应自己的缺短而得其养”

梁漱溟认为亲师取友是最好的调理自己的方法。他从中学开始就结交了一些亦师亦友的朋友，通过与他们在人生观、价值观与学术观上共同探讨、彼此质疑、互相问难，受益良多。

古人云：“智者不能自见其面，勇者不能自举其身。”每个人都难免会看不到自己的短处和偏狭，即使看清楚了又不易随时自主地调理自己。要解决这个问题，梁漱溟提出“亲师取友”的办法。“靠朋友之提醒以免于遗忘，这是一层；更进一层，就是靠朋友的好处，以融化感应自己的缺短而得其养。”

梁漱溟1917年受到蔡元培的邀请，在北京大学任教的六七年间，结识了梁启超、林宰平、伍连德、熊十力、李济深、陈铭枢、李大钊等，他们大部分比梁漱溟大10岁或20岁，他们之间的关系多在师徒之间。还有许多与梁漱溟年龄相仿的朋友，多是北大的学生，如冯友兰、朱谦之、陈政、罗常培、冯庸等，其中与陈亚三、黄艮庸、王平叔、张淑知等，“关系甚深，踪迹至密，几乎毕生相依者”。据梁培培撰写的《先父梁漱溟与北京大学》记载：梁漱溟与叶麟、朱谦之、黄艮庸他们，虽为师生关系，但并无所谓先生和学生，只是朋友，“四人性格见解并不相同，议论每多不合，但总觉得彼此相对是第一乐事”。梁漱溟认为他在北大期间，从蔡元培和诸同事、同学所获益处，直接间接，有形无形，说之不尽，于是得以经过自学钻研，在学识上有了自己的独立见解，并走向成熟。

“我的生命就在于责任一念”，为解决中国问题而躬行实践

梁漱溟做学问不是为学问而学问，实由自己的生活或生命遇到的问题，完全没有把学问当做一个客观的

外在的对象来治力和追求，学问是解决人生困惑的副产品，是为解决毕生思考的人生问题与社会问题服务的。他始终躬行实践。

梁漱溟在1951年写给其外甥邹晓青的信《寄晓青甥》中说：“我的生命就在于责任一念。处处皆有责任，而我总把最大的问题摆在心上。所谓最大的问题就是中国问题。而我亦没有把中国问题只作中国的问题看。不过作为一个中国人要来对世界人类尽其责任，就不能不从解决中国问题入手。在最大的问题中，我又选择其最

《行政管理改革》2020年第2期目录



【国家治理】
周文彰 数字政府和国家治理现代化

【本期关注 民法典草案（特约主持人：刘锐）】
刘锐 《民法典（草案）》的土地经营权规定应实质性修改
王洪亮 论民法典规范准用于行政协议
张彤 论民法典编纂视角下的个人信息保护立法
齐建辉 我国民法典编纂的现代性及其限度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陈鹏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背景下的中国社会结构变迁
张琳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社会救助水平的提升

【乡村振兴】
蔡之兵 张青 新时代中国农业生产力布局调整思路研究
董玮 张雪溪 秦国伟 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的资源配置逻辑与保障机制

【青年论坛】
马长俊 解构与重构：行业协会商会脱钩改革的政会关系变迁研究